

隋煬帝與佛教

關世謙

圓光佛學研究所

摘要

隋朝王國的第二代皇帝是煬帝，名廣。十二歲時，因為滅陳代統一隋朝天下的功勞，被冊封為晉王。後來，他為了即位稱帝，弑殺了父親「文帝」，也殺死胞兄「楊勇」，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稀有的暴君。

煬帝——晉王廣即位之後，開鑿了一條連結黃河與揚子江的大運河，對於周邊諸國也施行各項積極的外交政策，在南北的文化交流上有卓越的貢獻。另一方面，對於佛教與道教也有護持、顯揚的表現；尤其是對天台智者大師的尊崇與信仰而聞名一時。在位期間，設置許多道場，對於佛教採取保護與獎勵政策。

本篇翻譯稿以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所撰的三十卷《續高僧傳》為主要依據，而作下列五個方面的探討：（一）隋煬帝——晉王廣與佛教的淵源；（二）隋煬帝——晉王廣與天台智者大師的種種法緣；（三）隋朝江南區域「四道場」的設置過程與盛況；（四）隋朝佛寺的建造與統合和廢卻；（五）隋末佛教匪徒的叛亂。本文也舉出《辯正論》、《廣弘明集》、《大宋僧史略》、《佛祖統紀》等經典來說明以上的論點。

關鍵詞：續高僧傳、隋煬帝、晉王廣、智顛、四道場

• 晉王廣與佛教

隋朝王國的第二代皇帝是煬帝，名廣，別字英，小字阿?，是高祖文帝的次子。煬帝的「煬」字是：「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眾曰煬，逆天虐民曰煬」的意思。十二歲時當上晉王，因為殲滅陳代而有隋代之統一天下的功勞，可是，他為了即皇位而殺了父親「文帝」，並且又殺死胞兄「楊勇」；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稀有的暴君。另一方面他卻開鑿了一條連結黃河與揚子江的大運河；對於周邊諸國，為了推進積極的政策，在南北的文化交流上卻有卓越的貢獻。在暴君的反面，對於佛教與道教卻顯示其理解的表現；尤其在晉王廣的時代，因為對天台智者大師的尊崇與信仰而著名一時。即位之後，並設置內道場，對佛教則採取的是保護與獎勵政策。

開皇八年（西元 588 年），隋文帝以中國統一南北為目標，下令進擊征伐陳軍，其統帥就是文帝的次子——晉王廣（後來的煬帝），當時只是二十歲的青年。翌年正月，隋朝大軍近逼陳都建康，陳軍正想迎戰抗敵，卻很快地就被突破，於是都城陷落，王室及文武百官都遭俘虜，然後均被解送至長安。至此，江南的貴族文化，既告滅亡，在江南的佛教教團亦隨著被征服的同時，而必須接受隋朝的統制。可是，在江南僧眾當中，原本就發心想出家為僧者，准許了新的度僧。

隋朝之平定江南，對佛教寺院方面，依然與陳代同樣地准許其存續，在寺院與教團的統制上，當然是由新的統轄者所實施，如在〈隋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傳〉即有以下的記事：

隋朝剋定江表，憲令維新，一州之內止置佛寺二所，數外

伽藍皆從屏廢。

據此可以得知：隋朝爲了統制佛教的教團，行將制定新的法令，即是一州之內只准許設置兩所佛寺，其餘的則均予以廢絕。所謂的一州，是指哪一州？還是指江南全境的各州呢？雖然不明其所指，但一州只准設置兩所佛寺的構想，則是很明確的。

有關隋代的寺院數目，在《辯正論》卷三載有如次敘述：

右陳世五主，合三十四年，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國家新寺一十七所，百官造者六十八所，郭內大寺三百餘所。

儘管由於「侯景之亂」而建康的寺院都已被焚毀、破壞，可以還有上述的「郭內大寺三百餘所」看起來，朝廷只准一州二寺的明令，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新征服者的隋朝，當頒出上項法令時，慧覺則上奏以訴論只准設二所佛寺的非是，因之朝廷則撤回了這道法令，護法的信念異常強烈的慧覺，即爲晉王廣所迎迓，然後就在新設的慧日道場從事各項弘法利生的事業。

寺院的廢絕雖然一時得以倖免，但卻強制地改革了僧眾管轄機關的陳代僧官制度。這在《續高僧傳》卷二十一的〈揚都奉誠寺大律師智文傳〉有以下的記述：

大隋革運，別降綸言，既屏僧司，憲章律府。

這是詔命廢除僧錄司的僧眾管轄機關，而今守持律府，並且布告僧眾須嚴格地實施戒律。

開皇十年（西元 590 年），擔任并州總管的晉王廣，出任揚州總管而鎮守江都（揚州）。從此以後，江都就變成晉王廣弘揚佛教的基地，而江都的慧日道場便成爲江南佛教的中心。晉王廣於是邀集了許多的名僧來至慧日道場。

晉王廣並且也設置了收藏佛教經典的經藏，從而得知經藏的設置在南北朝時代即已盛行，例如：劉宋的佛窟寺經藏、南齊的大雲邑經藏、梁朝的華林園經藏、定林寺經藏、建初寺般若台經藏、長沙寺經藏、北齊的經藏、北周的經藏、五張寺藏等。另就年代上距隋代最近的五張寺經藏，在《陝縣志》卷二十一的《金石篇》，收錄有《北周陝州宏農郡五張寺經藏碑》文，據以得知，收藏有三百餘部的經論。王褒所撰的〈北周經藏願文〉，雖亦收錄在《廣弘明集》卷二十二，但其經藏設立的地點則不得而知，只說是奉造一切經藏，其卷數亦不曾提及。

煬帝設立寶台經藏的這件事，同在《廣弘明集》卷二十二收錄有煬帝的《寶台經藏願文》，據以當可明瞭：因為長期的戰亂，許多佛像及經典已經化歸灰燼，寺塔亦已遭湮滅，煬帝亦命眾軍收集佛像與經典，未及期月，即頗有所集，因而乃命學司作成目錄，展示於道場，並考證經典義理，校訂比對的結果，則可獲得根本經典原貌。寶台經藏的四藏，將及十萬軸的數量，煬帝撰寫願文祈望這些經藏能永遠流通。

煬帝儘管自己受持寶台經藏，並把所收集的經藏保存在慧日、法雲、日嚴、弘善等各道場或京師的寺塔，乃至諸方的精舍。並且是依照寺院的規模，僧徒數的多少，來斟酌增減其保管經典的數量，同時指示保管經典的僧徒必須鄭重將事於這項神聖事業。原則上，經典的根本是保管在經藏中，如有想要弘傳某部經典，得令來寺抄寫，而根本經典是不准流失的。從這些敕命中當可明瞭煬帝對於經典的收集與典藏，其所賦與的摯誠心力是異常熱烈。

在經典的收集與典藏的同時，重要的是有機會與很多名僧交往，而此一活動的中心就是江都的慧日道場，因此，慧日道場應該看作是江南的佛教中心。

曾以成實學者的身分，風靡一時的慧日道場智脫（541～607），曾應文帝之招請從事講論，後來煬帝創立了慧日道場，乃由道場的英賢群中遴選論士，以應講說。智脫就是當煬帝赴京師住入長安日嚴寺時，而與一方之雄並且素為教界所重的吉藏兩相對論，可以稱得上是英才之士。另據《續高僧傳》所示，應詔住入慧日道場的名僧，除了智脫之外，尚有：智矩、法侃、吉藏、慧覺、敬脫、慧越、慧乘、法安、法稱、道莊、法論等很多享譽一時的僧眾。

• 煬帝與天台智顛

天台宗的大成就者——天台智顛（五三八～九六），是江南佛教教界的重鎮。在晉王廣來說，一方面是策劃整肅江南的佛教界；另一方面則積極地錄用名僧，其中就有自陳代以來即在江南佛教教界享譽甚高，且在都城的金陵經常為帝王所依重而屢次講說經典的智顛，對於他的存在實在不容忽視。煬帝受到父親「文帝」推崇佛教政策的影響，在做晉王廣時代，就一向是尊崇佛教與僧眾。

在當時的名僧群中，晉王廣最為崇拜而以師事之的就是天台智顛。與之相交往的晉王廣，為了安定江南的佛教界，以及謀求人心之得到安定，似乎考慮到應該利用智顛在佛教界的勢力；另一方面也是想要以此來滿足自己的崇佛心情。

開皇十一年（西元59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晉王廣在揚州舉開千僧會，邀請智顛頂受菩薩戒，智顛當時即做菩薩戒師，授戒予晉王廣。在《國清百錄》卷二收錄有《王受菩薩戒疏第二十六》，其中詳細地載述了晉王廣布施供養予戒師的衣物及金錢等事，依之可知他是深摯地尊敬於天台智顛。當時晉王廣是二十三歲，而智顛則是五十四歲。另據《大宋僧史略》卷中所示：做為菩薩戒師的智顛，由晉王賜予國師的稱號。另一方面，智顛亦稱晉王名叫總持王。晉王對於智顛，則賜予「智者」的稱號，由之可以看出這是晉王廣與智顛最初的結交之始。

翌年三月（開皇十二年），智顛從揚州啓程去往廬山，更爲報答乃師（慧思）之恩，亦曾去慧思墓塔所在地的南岳衡山。並在這一年的歲暮，回歸故鄉荊州就在當陽縣建造了一音寺。不久即奉敕命將之改名玉泉寺，此寺人稱玉泉的源流而爲天台宗的一處聖地，在遭遇亢旱時，祈雨而即時獲降甘霖，爲此而接受了荊州總管王世積的歸依。開皇十五年（西元 595 年）智顛再度應晉王廣之邀來到了揚州的禪眾寺，並以手著的《淨名義疏》面呈晉王廣，到了九月，告辭即回歸天台山。爾後便致力於天台山的復舊事業的智顛，就在開皇十七年十月，接受晉王廣的招請而下山，途中行至天台山西門的石城寺即罹患重病，於是便把《發願疏文》及《遺書與晉王》託付弟子，終於在十一月二十四日逝世。

智顛遺書留給晉王廣很長的一篇遺書，其中智顛敘述六件遺憾的心情：第一、修行求證悟卻只是上負三寶下愧本心而已；第二、未能成就利他之行；第三、空受晉王廣的信施，卻未學化導之功；第四、徒有爲僧雄壯之志，卻未嘉惠於有緣之士；第五、在荊州雖曾會聚了千餘聽眾，以及教化三百禪眾，可是旋即散離，而未能繼續長時研修；第六、本想弘揚教法，因已返抵天台山，兼之身體衰弱而斷絕法緣等。在遺書中縷縷敘述以致晉王。他在天台山爲晉王撰著的《淨名義疏》謂爲未臻成熟之作，對於晉王廣，希望他能留心於佛法，如能鑽研佛陀的教法，政治則將愈益可期，而自己以往之所做爲，一切都是爲佛法、爲國土、爲眾生來加以強調，表明即此生命雖告竭盡，而身影仍守護國土的意向；更希望晉王廣能發心做玉泉寺的檀越，因在天台山麓曾建一寺，尙請爲寺賜名，另有許多發心出家之士，亦請晉王准許等等的心願諄諄傾訴不已。上述情節就是智顛遺留給晉王廣的遺書內容。

晉王廣接受了智顛所吐露的內心摯意，以及由弟子灌頂所呈獻的《淨名義疏》，對於天台山麓創建伽藍，荊州的玉泉寺、潭州的大明寺、荊州的十住寺、上明寺等充當檀越，乃至其他智顛所衷心願求的各節，都一一地答允承事，並且誓願不違智顛的教化。

從這封遺書的酬對來看，晉王廣自始就是想透過江南佛教界領袖的天台智顛以掌握佛教界，而智顛也希望順應晉王廣來保護佛教界的安泰。兩者之間儘管都有「眾人之事」方面的考量，但後來晉王廣終於傾服了智顛偉大人格的心感召，因而在智顛歿後，發心保護天台山，對於新建的寺院頒賜「國清寺」的敕匾，以祈願國家清平安康。

智顛的弟子灌頂章安與晉王廣的交往，在即帝位以後亦繼續不斷，對應智顛的追慕心懷，同時爲了鎮撫江南而肯定了天台的重要性。

• 「四道場」的設置

隋朝的江南策略，定爲首都的揚州，雖然設置了總管府，但爲了匯聚江南宗教界的人才，以統制宗教界，晉王廣在揚州設置了四道場。所謂四道場，是指慧日、法雲二道場及玉清、金洞二道觀而言。這是做效「文帝」在長安建造了大興善寺與玄都觀的官立的寺觀，因而在揚州亦擬建設二寺與二觀。於此在《續高僧傳》卷十五〈義解篇〉中，道宣述之如次：

自爰初晉邸即位，道場慧日、法雲廣陳釋侶，玉清、金洞備引李宗，一芸有稱，三徵別館，法輪長轉，慧炬恆明。

佛僧中的優秀之士，應邀至法雲道場與慧日道場；道士中的優異者，都引進到玉清觀與金洞觀，令其各轉法輪。另外在〈隋兩帝重佛宗之法，俱受歸戒事〉《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中，也有如次之述：

昔居晉府，盛集英髦，慧日法雲，道場興號，玉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搜揚，總歸晉邸，四事供給，三業依憑，禮以家僧，不屬州省，迄于終曆，徵訪莫窮。

煬帝匯集了佛道二教的英才，令住於四道場，供應以生活必須的資具，以家僧的禮遇，保障其終生於弘揚教法的事業，但這些僧道都不屬於當地州省的管轄，直接置於煬帝的朝廷所管轄。

煬帝將佛寺改為道場，道觀改為玄壇的這件事，在《隋書》卷二十八的〈百官志〉述謂：

郡縣佛寺改為道場，道觀改為玄壇，各置監丞。

由之看來也是很明顯的。

揚州的慧日、法雲二道場，雖然羅致了江南教界的俊秀，其中尤其是慧日道場所請到的有名高僧，就此已在前節裏列舉其中名號，由之得知慧日道場才是江南佛教的中心。這座慧日道場其創建日期儘管不大明悉，但在開皇十二年（西元 592 年）晉王廣致智顛的書信中可以約略推定其時間。

始於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場，安置照禪師以下，江陵論法師亦已遠至於內援，建立法雲道場，安置潭州覺禪師已下，即建深善，輒以諮知。

據此得知：外援方面建造了慧日道場；內援則起建了法雲道場。在慧日道場招請照禪師，論法師等進住；法雲道場則請潭州的覺禪師等進住。所謂外援、內援的意義是究何所指？雖然不盡明確，但其外援的慧日道場是在總管府的外郭部，從而認知是乃舉行佛事、說法、研學等而開闢的道場；至於內援的法雲道場，相信當是接近晉王私宅，用以舉辦王室家族的宗教生活，而類似於朝廷的內道場性質。具有官方的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功能的當然仍以慧日道場為是。

這封致智顛的書簡，押的日期是：開皇十二年十月十日。由之當可推定：佛教的兩個道場就是在這段時間裏所建立。在慧日道場所招請的照禪師，當是慧思門下的信照；而論法師則是法論。法論精詳於《成實論》，亦為梁代的明帝所招請，迨至煬帝，並亦聞知法論的高德人格，故而招請至慧日道場。法論亦曾住過長安的日嚴寺，並與文帝相謁見。

在江都的慧日道場，以義解僧為中心，招請到很多的高僧，但法雲道場招請的僧眾名字，只有上述的潭州覺禪師而已。在《唐高僧傳》等亦無進入法雲道場的記載。法雲道場既是內援的道場，相信，必是如同宮廷內的內道場那樣屬於私密性的。

江都的慧日道場所招請到的著名高僧之中，列有三論宗的吉藏、智矩以及慧覺、慧乘、智脫、法澄、道莊等人。

三論宗的大成就者——吉藏，曾接受陳朝桂陽王的歸依而為江南佛教界的導師，亦為煬帝迎至慧日道場而優遇有加。又在都城開創日嚴寺時，他亦移居於此，以長安佛教界之雄的地位弘揚三論宗。相信三論宗之傳往高句麗或日本，最初也是受到吉藏在中央宣揚佛教的影響。吉藏並且也住過延興寺，終於在武德六年（西元 623 年）五月以七十五歲逝世。

智矩 曾在建康建初寺講三論，聽眾經常都有百人，他亦應煬帝的招請而住慧日道場，後來又移於長安的日嚴寺，人稱當時的俊傑，而評價猶在吉藏之上。在大業二年（西元 606 年）正月以七十二歲歿世。

先前所述寶台經藏的主持人慧覺，曾受陳代晉安王伯恭的禮遇，當煬帝建立慧日道場時，亦迎請其轉法輪。

陳武帝待以厚遇親任的慧乘，亦被招請至慧日道場以家僧的稱號為一代龍象，開皇十七年（西元 597 年）曾在揚州永福寺建立香台。大業六年（西元 610 年）奉敕命在東都的四方館行道，做大講主。晚年則住勝光寺，受到唐朝王室的尊崇。貞觀四年（西元 630 年）十月二十日 以七十六歲逝世。

應陳帝的邀請而入內講說的智脫，頗受鄱陽王伯山、僕射王克、中書王固等的敬仰，亦曾進入慧日道場，後來更移住長安日嚴寺，大業元年（西元 605 年）赴洛陽，住入東都內慧日道場，大業三年（西元 607 年）歿世，壽六十七歲。

與智脫同在《續高僧傳》卷九有其傳記的法澄與道莊，都曾由江都的慧日道場移住於長安日嚴寺，再行轉住於東都的慧日道場。

以上所述都是應請曾住慧日道場的名僧，但也有奉詔而拒絕招請的事例，例如彭城崇聖道場的靖嵩，乃精通《攝大乘論》的一方之雄，因而亦被招請往四道場，但卻拒赴邀，乃固辭敕命申述其理由如次：

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內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為解脫，如何返以事業累乎？吾曾遊兩都，屬逢播蕩，弊此勞役耳！

是說王城自有其界限，行動殊有困難，雖是內道場，亦未曾遠離俗世間，求解脫的是沙門，不宜為世間事業所累，自己曾遊於東西兩京，因為戰亂與毀佛活動而積有流浪的經驗，若再出任於內道場，也只有疲憊而毫無意義。這就是他的拒請原由。靖嵩曾自建立道場，以長達三十年的時間作為其修行道場，由此可見其真正的佛教修行人所採取的修行方式。蘇州武丘山的智琰，亦受陳朝帝王的厚遇親信，後來應煬帝之招下得山來，但卻以疾病為由而未出任於四道場，就此回山而去。

應邀被招請到慧日道場的佛教高僧，幾乎都是三論、成實等精通的義解僧；又因為移住於長安日嚴寺及洛陽慧日道場的原因，把江南三論和成實教學，因而傳播中原地方，後來即與北方的地論及華嚴相融合，於是便蔚成了隋唐新佛教，隨即開拓了新宗派的基礎，助成於南北佛教義學的流合，當是慧日道場存在意義所示。

但是，新的統治者的隋煬帝，其所招請到的江南佛教才俊，都是隨從統治者意願以順應佛事諸端，但卻完全失去了曾經著作《沙門不敬王者論》的廬山慧遠的氣概精神，迎合於權勢者沙門，在時代的大勢所趨之下，鑒於北周毀佛的痛楚辛酸，對當時的沙門來說，誠然亦有其情非得已的走勢。

• 佛寺的建造與統合和廢卻

隋文帝在長安造大興善寺，並在四十五州建立大興國寺既如前述。文帝也在此之外，於亳州（安徽亳縣）也建造了天居寺，在并州（山西太原西南）建武帝寺，在仁壽宮建三善寺，亦為獻皇后建東禪寺，又在五嶽及諸州名山之下各建僧寺一所。

煬帝於大業元年為文帝造立西禪定寺，又在高陽建隆聖寺，在并州建弘善寺，在揚州建慧日道場，在京師建清禪寺、日嚴寺、香台寺，並將九宮變造為九寺，猶建立泰陵、莊陵二寺。

隋文帝與煬帝的二主三十七年之間，建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有二十三萬六千二百人，譯經有二十六位經師，八十二部經論。

隋代佛教的特色，就是建立的官立寺院最多可資舉列，包括內道場及地方官立寺院的營造。內道場是皇城內的寺院，皇族們為了崇拜佛教所設立的皇族家庭式的寺院。在宮庭內建寺院的舉動，已經在東晉孝武帝時見於當世，在《晉書》卷九·〈孝武帝紀〉有如次的記述：

六年（太元）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

把精舍建立在宮殿之內，雖然也可以看作是內道場，但就這種情形而言，與其說是內道場，其實也就是設在殿內的寺院，而招請沙門進住的程度而已。贊寧在《大宋僧史略》卷中即有如次的敘述：

內道場起於後魏，而得名在乎隋朝何耶？煬帝以我為古，變革事多，改僧寺為道場，改道觀為方壇，若內中僧事，則謂之內道場也。

內道場說是始自隋煬帝，是在宮廷中舉辦佛事之處就是內道場。在宋代則稱為內寺。又有契嵩說在北周的宣帝大成元年（西元 579 年）正月十五日，尊重三寶而出詔，由舊沙門中遴選德行清高者七人，命於政武帝之西行道，說為內道場之始。此事在《廣弘明集》卷十於任道林之上表中亦有所見，但卻並未提到建造內道場。在《僧史略》之述及煬帝之建立內道場，是指在江都王城內建立慧日、法雲二道場，並在東都洛陽亦建立慧日內道場。

煬帝於即位之後，在洛陽設置慧日內道場，以此做為弘法中心。大業元年（西元 605 年）乃以大隋國運既臻隆盛，遂集義學沙門及四海首領於慧日道場。例如隋太尉尚書令楊素即邀請名僧道基至東都，請住慧日道場。東都的慧日內道場也是講學的中心，隨從淨影寺慧遠的澤州清化寺智徽（560～638）亦於大業七年（西元 611 年）奉敕命迎至東都的內道場，接受了豐盛的供養，卻並未接受禮物。

在東都的內道場奉敕命撰述了諸經目錄，從《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四中可以看到有關記事：

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為之者，別為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樂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為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大業年間在東內道場撰述經目，並加分類為大乘、小乘、雜經等三部。在東都內道場，明顯地也曾從事於蒐集佛典乃至分類等事業。

在東都洛陽，亦以翻譯道場的型式設置翻經館，於此在《續高僧傳》卷二的《達磨笈多傳》述之如次：

煬帝定鼎東都，敬重隆厚，至於佛法，彌增崇樹，乃下敕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搜學翹秀，永鎮傳法。

煬帝在洛陽南濱的上林園中設置翻經館，請達摩笈多等外國僧眾住入其中，以從事翻譯經典的事業。於上林園的翻譯經館素有深厚因緣的就是上林園翻經館沙門彥琮。在《續高僧傳》卷二的《彥琮傳》中有以下的記述：

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崑崙書，多梨樹葉，有敕送館付琮披覽，并便編敘目錄。

隋仁壽三年（西元 603 年）劉方平定交州，並驩州道行軍總管的劉方，率領欽州刺史寧長真等萬餘官兵以經略林邑。平定林邑時，獲得佛經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部，以及崑崙書、多梨葉樹等，奉敕命送至洛陽的翻經館，然後由彥琮據以編纂成目錄。西方長安的大興善寺的譯經館，在隋代也是第一座的國立譯經館。在大興善寺的譯經館有：那連提梨耶舍、毗尼多流支、闍那崛多、達摩笈多等經師從事於譯經。至於有關譯經的具體事跡，將在第六卷中詳述其所以，謹此省略。應對於隋文帝之在長安大興善寺設立譯經館，煬帝也在洛陽上林園設立翻經館。

此外，煬帝也建立了日嚴寺。仁壽元年（西元 601 年）煬帝為晉王在長安的青龍坊西南隅，營造日嚴寺以廣招名僧。這座日嚴寺到了唐代貞觀六年（西元 632 年）即已成為廢寺。應邀受請的名僧當中有：智脫、道莊、知矩、慧感、慧蹟、辨義、明舜、慧顛、法顯、曇瑒、慧常、智

果、善權、法琰 等人，尤其著名當是三論宗吉藏，他是在日嚴寺創建的同時，即進住長安，住日嚴寺。直到唐代成爲廢寺止，日嚴寺乃煬帝創建之寺，同時也是長安佛教界的重鎮。

與日嚴寺同爲煬帝所創建的寺院，則是大禪定寺。煬帝於大業元年（西元 605 年）營造大禪道場（大禪定寺），奉敕命由童真 進住。大業三年華嚴的靈幹 爲大禪寺道場的上座。另外，還有：寶襲、普曠、僧辯、法常、道洪、靖玄等名僧，均曾進住大禪定道場。大業五年智梵 並亦入住。又於大業八年（西元 612 年）攝論學家道岳 亦住大禪定道場。大禪定道場在唐代的武德元年（西元 618 年），改名大總持寺。

大業七年（西元 611 年）煬帝第一次遠征高麗而失敗，爲此即在翌年堅決舉兵第二次遠征，甚至親自統軍到遼水，宇文述等的隋軍在薩水爲高麗軍大敗，但煬帝又在大業十年（西元 614 年）施行第三次遠征，幾次的遠征高句麗，使得隋朝的國力大受損耗，不久旋又引起農民的暴動，乃至地方叛亂應運而生，以致走向滅亡的一途。

無可否認地，煬帝確曾建立起許多的寺院，但消耗的國力亦至深且鉅。就在遠征高句麗的前後，把這些寺院加以統合或廢卻。在唐代高臨的《冥報記》，即曾敘述鄜州寶室寺沙門法藏的靈驗譚：嚴持戒行的法藏，於開皇十三年（西元 593 年）在洛陽交縣的韋州城建造寺院，是一座佛殿精緻，僧房華麗，靈像及幡華亦頗莊嚴。就在大業五年（西元 609 年）朝廷頒令合併寺塔，將佛像送往各州大寺的敕命，這就是寺院及佛像的統合或廢卻之令。法藏 對於佛像，或有破壞者，便加以補修或造堂安置，並又書寫一切經八百卷。

大業五年頒示寺院的統合或廢卻之令，於此在其他的史料亦有明述：例如在《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的〈五扶風岐山南古塔〉條有：此塔者，原係阿育王寺，由於北周的毀佛僅只存留二堂而已，到了隋代，則在此設置了成實寺。

但在大業五年，因爲住僧不滿五十眾而遭廢寺，接著則被京師的寶昌寺所統合，而住僧則編入到寶昌寺的僧眾當中。至於古塔的基地，則變成爲寺莊。在《佛祖統紀》卷三十九的大業五年條，述其事 如次：

五年，詔天下僧徒無德業者，並令罷道，寺院準僧量留，餘並毀折。

僧眾中戒德疏荒者令還俗，寺院中住僧少者命廢卻，只有幾座大的寺院存續下來。

此一事件的後續發展，在《佛祖統紀》繼之就有廬山福林的大志禪師燒身自殺的記事。原因是上項廢佛之令既出，大志就在佛前哭訴了三天，然後便下決心願捨身命以明佛道，並赴東都遞呈上表之文，文中提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僧（自稱）當燃臂以報國恩。」煬帝當下命准所奏，大志禪師於是就逕入火定三昧而歿。

大業五年，應對廢佛政策而以死抗議的僧眾時有所聞，緣於此一廢佛令的結果，在京師的大興城（長安）中，在大業七年（西元 611 年）就有聖敬寺、仁法寺、明覺寺、香海寺等二十一座寺

院遭毀廢。而其緣故是因為遠征高句麗的策劃與備戰資源的調度，乃至徵用青壯年的勞動力等，非謂全無關連。

• 佛教匪徒的叛亂

由於征討高句麗的失敗，以致斷送了煬帝的性命。其最初的出兵。因為敗陣而撤退之際，大軍即遭受到嚴重的損傷，當敗戰的消息傳到後方時，各地隨即興起叛亂的傳聞。當第二次遠征時，掌管後方兵站的楊玄感就興謀叛亂，但因被追緝逃亡，則得以倖免危機。第三次勉強地總算以征伐高句麗為號召而招募兵士，但各地方的叛亂卻愈形擴大。

隋末的農民起義，其擔當首領的則有：王薄（？～六二二）、孫安祖（？～六一一）、劉元進（？～六一三）、朱燮（？～六一三）、管崇（？～六一三）、向海明（？～六一三）、劉迦論（？～六一四）、張金稱（？～六一六）、高士達（？～六一六）、操師乞（？～六一六）、格謙（？～六一六）、翟讓（？～六一七）、盧明月（？～六一七）、單雄信（？～六二一）、竇建德（五七三～六二一）、祖君彥（？～六一八）、朱粲（？～六二一）、孟海公（？～六二一）、李子通（？～六二二）、林士弘（？～六二二）、劉黑闥（？～六二三）、徐圓明（？～六二三）、高開道（？～六二四）、杜伏威（？～六二四）、輔公祐（？～六二四）、王雄誕（？～六二三）、閻稜（？～六二三）、孟讓、郭方預、郝孝德、孫宣雅、苗海潮、白瑜娑、王須、魏刀兒（？～六一八）、張善安（？～六二四）等人，為數確實不少。這一農民起的舉動，包括了各方的叛亂風潮；另一方面，大業九年（西元 613 年）參加楊玄感叛亂的李密（五八二～六一六），後來則加入了瓦崗軍，以首領的姿態，列舉煬帝的十大罪狀以抵抗隋軍。上述這些農民起義軍和瓦崗義軍的首領，他們的亡年大都是在六一三～六一八年的隋末時期，大多是因為叛亂失敗而被誅殺。

在隋末的叛亂事件當中，也夾雜有佛教匪徒的叛亂。大業六年（西元 610 年）正月，身著白練、裙襦、手持香花的匪徒，從東都的建國闖入，自稱彌勒佛降世，搶奪衛士的執仗而起叛亂，煬帝的次子——齊王暕將之斬殺，並在都下大事搜索，結果遭到連坐者達千餘家，可見這是一件大規模的叛亂。

假彌勒佛的名號而興叛亂的，在大業九年（西元 613 年）亦曾發起：唐縣（河北博陵）出身的宗子賢，自稱彌勒佛出世而主謀叛亂。他的為人擅長幻術以眩惑眾人，經常在夜裏變現樓上的光明以為佛的形象，又能在殿堂上懸一大鏡，在紙上描繪出蛇、禽獸或人的形狀，當人們前來禮拜時，則迴轉大鏡，使得紙上的形態映現在鏡面上以供觀覽，有時也為禮拜者在紙上描畫蛇形映現在鏡中，提供禮拜者觀看以令驚懼，於是宋子賢就是向禮拜者說：「這就是你的罪業所構成，你必須更虔誠地禮拜禱念。」告訴他。當禮拜者再度前來造訪禮拜時，則看到鏡子裏就變現出人的形狀，用以眩惑人心，收攬人心，於是遠近的民眾日或數百，乃至數千人都成為宋子賢的幻術信徒。不久之後，宋子賢就籌畫陰謀，對外以佛教之舉辦無遮大法會為掩護，而他的集團則從中學兵叛亂。一時，因為煬帝適在高陽（河北·高陽），他們設計想襲擊煬帝的乘輿，事件被發覺於未然，乃由鷹揚郎將軍率兵將要逮捕宋子賢時，先行包圍宋子賢的住處，但兵士只見他的居所是一個大火坑，於是兵士們無人敢冒進，鷹揚郎見狀說：「此地方原本沒有什麼坑洞，這只是他利

用幻術，大家才看到了坑的出現，現在必須讓這個妖術停止！」說著就挺身走入火坑。結果火坑就應身而消逝，接著就當場逮住了宋子賢，然後將之斬殺。同時也連累了他的夥伴達千餘家。此一事件是在煬帝行幸於博陵（高陽縣）時發生的，時間是在大業九年九月到十月之間。

大業九年十二月，稱為彌勒佛的叛亂事件又發生了，在《隋書》卷四·〈帝紀〉第四·煬帝有下列的記載：

丁亥（十二月）扶風人向海明，舉兵作亂，稱皇帝；建元白鳥，遣太僕即楊義臣擊破之。

在《隋書》卷二十二·〈五行志〉下，更有詳細的記述：「扶風（陝西·扶風）出身的向海明，原本是僧侶，忽然自稱彌勒佛出世而興起叛亂。他鼓吹：信徒們若能傾心於向海明者，則能得吉夢。於是很多人都被他所幻惑。鄰近長安的三輔（長安以東的京兆尹、長陵以北的左馮翊、渭城以西的右扶風之地）有許多民眾，都成群地集聚在一起，稱向海明是大聖，然後則舉兵起義，其數量多達數萬人。朝廷則派大軍將之圍剿擊破。自從這次的暴亂之後，天下則呈大亂的局勢，甚至到達「路無行人」的狀況。把當時的天下動亂，由京房在《易飛候》的書中所作的預言，在《隋書·五行志》下之所傳述。

翌年（大業十年），同是扶風人的唐弼，亦舉兵興起叛亂，他所統轄的匪眾，據說有十萬人。他們擁戴李弘為天子，而李弘則自稱唐王（《隋書》卷四·〈帝紀〉第四·煬帝下），這些人就從長安的鄰近地區興起叛亂，此正以暗示隋的命運前途。

因為隋末的叛亂及戰亂，則有很多的寺院都為所湮滅。據《續高僧傳》卷二十四的〈唐鄧州興寺智勤傳〉所記載：只有智勤苦守的鄧州（河南·鄧縣）大興國寺未遭賊匪所侵犯，寺院裏的建築、經典、佛像等亦都毫無損傷，而一般的狀況，則是諸寺湮滅，目不可見。」的記述。可見隋末時期，佛寺大多都遭破壞。當賊匪來襲寺時，在僧衣之上著以俗服，雖能避過兵刃，卻遭遇賊寇的圍殺，此刻忽然來自空中的聲音說：「師可脫去俗衣！」智勤聽罷連忙脫掉俗服，賊寇見狀隨即頂禮供養。這是穿僧衣的出家人不遭斬殺的事例之一。總之，由於隋末的戰亂，乃至佛寺亦多為所蹂躪。

征討高句麗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戰敗，以及開鑿大運河的大規模土木工程，為此而民力疲弊，國資耗竭，煬帝也就走上了生命盡頭，終於在揚都被部下所殺害。在晉陽舉兵起義原屬武川軍閥的李淵、李世民父子，則長驅直入都城長安，然後擁立煬帝之子——恭帝為天子，但不久即被廢而自即帝位，直到這裏，隋王朝即已名實都滅亡了。

Emperor Yang and the Buddhism of the Sui Dynasty

Shih-Chien Guan

Yuan Kuang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Summary

The second emperor of the kingdom of the Sui Dynasty (隋朝) was the Emperor Yang (楊帝). His layname is *Guang* (廣). When he was twelve years old, he conquered the Chen Dynasty (陳朝) and established the kingdom of Sui, thereafter receiving the honorary title *Jin Wang Guang* (晉王廣). Afterwards, because he wanted to usurp the throne and become emperor, he killed his father Emperor Wen and his older brother Yangyo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 it can be said that such a ruthless emperor was indeed rare.

After ascending the throne, Emperor Yang (Jin Wang Guang) built a canal connecting the Yellow and Yangtze Rivers . He was very aggressive in establishing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kingdoms so he was instrumental in fostering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He was also a supporter of Buddhism and Daoism and he worked to propagate the teachings of both of these religions. It was widely known that Emperor Yang especially venerated the great Buddhist master Chih Tse (智者) of the Tien Tai (Heavenly Platform / 天台) school. Emperor Yang established numerous monasteries throughout the land and instituted a policy rewarding Buddhism with support and protectio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irty scrolls in the *Continuation of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續高僧傳) written by the Tang Dynasty monk Shih Dao Hsuan of the Hsi Ming Monastery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 The following five issues are addressed in this paper: 1) the root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mperor Yang (Jin Wang Guang) of the Sui Dynasty and Buddhism; 2) the Buddhist affinity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and Master Chih Tse of the Tien Tai school; 3) the development and grandeur of the "Four Centers of Cultivation" in Southern China during the Sui period; 4) the construction, unification, and abandonment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during the Sui period; 5) Traitors of Buddhism and their insurrection at the end of the Sui period. This paper also uses key points from *Debate of the Correct Treatise* 《辯正論》, *Guang Hung Ming Compendium* 《廣弘明集》, *Summarized History of Sung Dynasty Monks* 《大宋僧史略》, *Series of Records of The Buddha* 《佛祖統紀》, and other scriptural texts in support of the argument put forth above.

Key words : *Continuation of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Jin Wang Guang, Chih-I, Four Centers of Cultivation

唐 · 釋法琳 撰〈十代奉佛上篇〉《辯正論》卷 3 ；《大正藏》冊 52 ，頁 502-505 。

〈孝武帝紀〉《晉書》卷 9 。

右街僧錄通慧大師贊寧奉撰《三十九內道場 · 大宋僧史略卷中》；《大正藏》冊 54 ，頁 247 。

(咸平二年重更修理)

唐 · 釋道宣撰《周高祖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請開法事·廣弘明集卷第十》；《大正藏》冊 52，頁 154。

35 唐 · 釋道宣撰《唐益州福成寺釋道基傳二》《續高僧傳》卷 14，《大正藏》冊 50，頁 531-532。

36 唐 · 釋道宣撰《唐澤州清化寺釋智徽傳七》《續高僧傳》卷 15；《大正藏》冊 50，頁 541。

《經籍志》四；《隋書》卷 35。

唐 · 釋道宣撰〈隋東都雒濱上林園翻經館南賢豆沙門達摩笈多傳〉《續高僧傳》卷 2；《大正藏》冊 50，頁 434-436。

唐 · 釋道宣撰〈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彥琮傳〉《續高僧傳》卷 2；《大正藏》冊 50，頁 436-439。

請參閱《資治通鑑》卷 180，煬帝大業元年條，《隋書》卷 82，《南蠻傳》林邑條。

同註 39。

唐 · 釋道宣撰〈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傳〉《續高僧傳》卷 9；《大正藏》冊 50，頁 499。

唐 · 釋道宣撰〈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傳〉《續高僧傳》卷 11；《大正藏》冊 50，頁 510-511。

唐 · 釋道宣撰〈唐京師崇義寺釋慧顏傳〉《續高僧傳》卷 14；《大正藏》冊 50，頁 533-534。

唐 · 釋道宣撰〈隋京師沙門寺釋法顯傳〉《續高僧傳》卷 26；《大正藏》冊 50，頁 670。

唐 · 釋道宣撰〈唐京師玄法寺釋法琰傳〉《續高僧傳》卷 30；《大正藏》冊 50，頁 704。

唐 · 釋道宣撰〈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童真傳〉《續高僧傳》卷 12，《大正藏》冊 50，頁 517-518。

唐 · 釋道宣撰〈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傳〉《續高僧傳》卷 12；《大正藏》冊 50，頁 518。

唐 · 釋道宣 撰 〈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智梵傳 〉 《 續高僧傳卷 》 第 11 ； 《 大正藏 》 冊 50 ， 頁 511 。

唐 · 釋道宣 撰 〈 唐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傳 〉 《 續高僧傳 》 卷 13 ， 《 大正藏 》 冊 50 ， 頁 527-528 。

唐 · 釋道宣 撰 〈 唐 終南山紫蓋沙門 釋法藏 傳 〉 《 續高僧傳 》 卷 19 ； 《 大正藏 》 冊 50 ， 頁 580-581 。

宋 · 志磐 撰 〈 法運通塞志 〉 《 佛祖統紀 》 卷 39 ； 《 大正藏 》 冊 49 ， 頁 362 。

請參閱塚本前引書頁 181 。

《 中國歷代人名辭典 》 江西：教育出版社，頁 317-333 。

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 《 隋書 》 卷 59 · 列傳第二十四 。

譯稿出處與原作者：鎌田茂雄著 《 中國佛教 》 第五卷 。

唐 · 釋道宣 撰 〈 隋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傳 〉 《 續高僧傳 》 卷 12 ； 《 大正藏 》 冊 50 ， 頁 515 。

唐 · 釋法琳 撰 《 辯正論 》 卷 3 ； 《 大正藏 》 冊 52 ， 頁 503 。

唐 · 釋道宣 撰 《 續高僧傳 》 卷 21 ； 《 大正藏 》 冊 50 ， 頁 609 。

《 資治通鑑 》 卷 177 ； 《 隋記 》 一 。

湯用彤著 《 漢魏兩晉南北朝教史 》 ， 新華書店 ， 1955 ， 頁 593 。

唐 · 釋道宣 撰 〈 法義篇 〉 第 4-5 《 廣弘明集 》 卷 22 ； 《 大正藏 》 冊 52 ， 頁 257 。

唐 · 釋道宣 撰 《 續高僧傳 》 卷 9 ； 《 大正藏 》 冊 50 ， 頁 560 。

藍吉富 著 《 隋代佛教史述論 》 ， 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3 年 5 月， 頁 25 。

有關煬帝與智顓的交往，請參閱山崎龍《煬帝與天台智顓》，《隋唐弘教史研究》頁 117 以下（日本：法藏館，昭和 42 年）。以及塚本善隆《隋?江南征服?佛教：晉王廣（煬帝 1 ）?江南佛教》（《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三卷 · 中國中世佛教史論攷 · 收於第六）等。

11 隋 · 灌頂 纂 〈 王受菩薩戒疏 〉 第二十六， 《 國清百錄 》 卷 2 ； 《 大正藏 》 冊 46 ， 頁 803 。

贊寧 撰〈三十四國師〉《大宋僧史略》卷中；《大正藏》冊 54，頁 244。(咸平二年重新更 修理)

贊寧 撰〈四十三賜師號〉《大宋僧史略》卷下；《大正藏》冊 54，頁 249。(咸平二年重新更 修理)

隋 · 灌頂 纂〈發願疏文〉第六十四，〈遺書與晉王〉第六十五 《國清百錄》卷 3；《大正藏》冊 46，頁 809。

15 宋 · 志磐 撰 〈東土九祖〉 第三之一，《佛祖統紀》卷 6；《大正藏》冊 49，頁 184-185。

16 請參閱前引書註 14。

17 隋 · 灌頂 纂〈王答遺旨文〉第六十六，《國清百錄》卷 3；《大正藏》冊 46，頁 810。

唐 · 釋道宣 撰 〈唐京師慈恩寺釋義褒傳〉《續高僧傳》卷 15；《大正藏》冊 50，頁 548。

19 唐 · 釋道宣 撰 〈隋兩帝重佛宗 法俱受歸戒事〉《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大正藏》冊 52，頁 379。

〈百官志〉《隋書》卷 28。

隋 · 灌頂 纂 〈王重遣匡山參書〉《國清百錄》卷 3；《大正藏》冊 46，頁 806。

請參閱山崎前引書，頁 136-137。

唐 · 釋道宣 撰 〈隋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傳〉《續高僧傳》卷 9；《大正藏》冊 50，頁 500。

唐 · 釋道宣 撰 〈唐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續高僧傳》卷 11；《大正藏》冊 50，頁 513-514。

唐 · 釋道宣 撰 〈隋 西京日嚴道場釋智 矩 傳〉《續高僧傳》卷 11；《大正藏》冊 50，頁 509。

唐 · 釋道宣 撰 〈隋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傳〉《續高僧傳》卷 12；《大正藏》冊 50，頁 516。

唐・釋道宣撰〈唐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續高僧傳》卷 24；《大正藏》冊 50，頁 633-634。

唐・釋道宣撰〈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智脫傳〉《續高僧傳》卷 9；《大正藏》冊 50，頁 498-499。

唐・釋道宣撰〈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續高僧傳》卷 10；《大正藏》冊 50，頁 501-502。

唐・釋道宣撰〈唐蘇州武丘山釋智琰傳〉《續高僧傳》卷 14；《大正藏》冊 50，頁 531-532。

